

“中国文化复兴论”问题之所在

◇ 金惠敏

“中国文化复兴论”(这里指中国传统文化之复兴,或者其核心儒学之复兴)可谓源远流长,贯穿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失败、抵抗、崛起这整个历史进程,到1990年代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及其不断提高的全球治理参与度而日益成为一个备受追捧的命题。

当下,中国文化复兴论表现为许多人完全无需沉思、脱口即来的“集体无意识”。王蒙先生一方面主张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甚至坚持“拒绝现代化,就是自绝于地球”,但另一方面也总是不经间将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阐释为“中华传统文化伟大复兴”,认为“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一部分”,混淆了民族复兴与传统文化复兴的原则性区别。再如,陈先达先生一直对学界有人主张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保持高度警惕,因而他能够及时地扭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含义,使其与儒学复古主义区别开来,他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复古口号,不是在文化上要回到古代,复我汉唐衣冠和古礼古风,而是在文化上,应该恢复中国以往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曾经作出的重要贡献。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内容发展当代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按照陈先达的预期,将来的文化在性质上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这样的文化是汲取了中外古今一切优秀文化、先进文化而创新出来的新的复合型文化,而非简单的中华传统文化复兴!

过去的或曰古典的中华文化能够复活吗

如果说中华传统文化是指经典文本以及蕴含于其间的思想,这样的文化只能被当代人活学活用于活的当下。在此,活着的是当代人对经典的当前使

用,而非经典自身。在古今之间,从不改变的中心乃今人的生活实践和生产实践。这意味着经典依附于活人而复活,如果说它有生命,那也仅仅是寄存性、寄生性的、依附性的;且更为关键的是,凡使用均是挪用、借用、选用,当然不是如其本然的使用。西方的“文艺复兴”不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活,而是资本主义需要借此以为自身开辟道路,因而其所谓“复兴”不过是一比喻性的说法,不必较真。常识是:过去是无法出现于当前的,其出现之多寡取决于当前之需要。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是说一切历史都将被当代化。历史复活论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说法,它把历史想象为某些宗教中的灵童转世,或者,就像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不过是绝对概念的演绎,概念之外无世界。在这样的意义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复活问题,而只有那永不寂灭者(如神灵和概念)不断地变换其外观形式而已。也就是说,复活论总是难以逃避被理解为整体复活的嫌疑,而历史是绝对不可能整体复活、复现的。历史不是同一物之轮回,而是同一物在时间之流中不断更新自身,即不断地生成,不断地成为非同一物的过程。

文化自信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盲目自信

说到“文化自信”,都确定无疑地是指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而非单单指“中华传统文化”,即便它是其中的有机构成。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这也只是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来源,而当其汇流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崭新的文化大江大河之时,它必然要接受后者的剪裁、调试、改造、整合,因而也必然不再只是过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

任何文化都是实践及其需要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亦不例外,它“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因而也必须反映、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内在需求。作为其中一个来源、一个构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也应该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取予,即接受“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原样复活,而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断非中国文化复兴论者所想象的一种古老文化的复活或再生。

“民族复兴”并非只是“传统文化复兴”

学界许多人太容易将民族复兴在本质上归结为传统文化复兴,例如贺麟先生在其素有“新儒家宣言”之称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1年)一文中主张:“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不仅是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如果不是其中读到“抗战”字样,我们真可能误以为此乃时文之所论。近八十年前的旧论仍是现前的时论。

其错误显而易见:中华民族是伟大的实践主体,而中华传统文化则是这一实践主体所需要的众多文化资源之一。既然位居与民族复兴相谐振的新文化之中,但仅为其一,而非其全部,我们便不能称此融合了各种资源的新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独家之复兴。诚然,旧文化会以某种方式进入新文化,但汇入新文化的旧文化绝非一仍其旧、我行我素,而是被赋予新的位置、价值和意义,从而成为新的文化的一个构成要素。“传统”不是“僵死”的同义语,而是意味着“流变”,非变化不得以流传;就此而言,“传统”恰恰意味着“日新(其旧)”。使其日新者,一是实践,再是以实践为导向的其他文化资源,即实践有充裕的文化选择,而传统文化只是其诸多选项之一。可以预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非其传统文化之复兴;相

反,它将带来对其自身文化的扬弃和超越,带来对各种文化资源的超级融合,从而是一种新的“文化拓扑学”的出现。

能够设想单一的文化自我吗

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论本质上是自我中心主义。无论其为自恋型、自卑型或自大型,其共同特点都是阻断自我与他者的联系。然而,从哲学上看,纵使将自我提升到孤绝的程度,那也不过是对他者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承认和容纳:切割总是意味着另一种连接。甚至,自我愈是坚意与他者划清界限,其与他者的关系便愈是牢不可分;它们处在共现之中,彼此都得到了更加清晰的呈现。自我位于他者的另一极,二者共处一种差异和比较的意识之中。除非将自我从意识中彻底清除出去,否则他者总是一再浮现。但没有对象意识是不可想象的,只要想到、说到自我,他者(对象)便一起被钩沉。更精确地说,自我同时即意味着他者,意味着与他者的对话性关系。

自我与他者并非只在意识中共现,亦并非仅仅在意识中发生联结,而且是实践性的。当自我意识到他者的存在,他者就构成了其参照物,自我会参照他者来变革自身,以使自身更加强大。它在实践层面咀嚼他者、消化他者,将他者变成自我的一个有机部分。在今日中国的社会身体中不是随便就可以看见他者的元素吗?!不,我们经常看不见我们的社会身体之内何者为本来、何者为外来。原先意义上的自我与他者及其区隔已不复存在。我们意识到世界的存在,我们也将行动于世界。自我无法孤绝于世界。

新时代需要新思维,即超越了中西二元对立思维、画地(自我)为牢的全球对话主义或曰“间在对话论”。自此以后,我们不要再轻言“中国传统文化复兴”,或者本体论的中国文化特殊性,那不是强者的文化自信。今日中国的眼光是拥抱整个世界,是为解决世界问题,乃至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简介:金惠敏,河南浙川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自《社会科学报》2020年09月03日006版)